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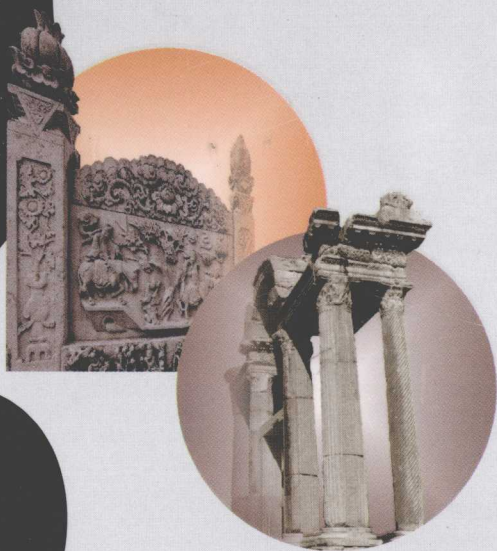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

ZHONGWAI WENLUNSHI

中外文论史

第三卷

曹顺庆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013047860

I109
96
V3

比

四川大学“

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项目

中外文论史

第三卷

曹顺庆 主编



I109
96
V3



北航

C1655339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比较文学与文艺学丛书》编委会

主 编：曹顺庆

编 委：冯宪光 王晓路 李 怡

徐新建 刘亚丁 阎 嘉

吴兴明 段志洪

秘 书：王彤伟

导 论

本卷是《中外文论史》第三卷，包含第五编（公元7至9世纪文论）和第六编（公元10至13世纪文论），时间跨度从公元7世纪到公元13世纪，约六百年时间，具体而言，这个时间段约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中晚期。这个时期也正好相当于中国的隋、唐、五代、两宋时期（581—1279）。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学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虽然其文学理论的成就没能超越魏晋南北朝，但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同样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世界三大文论之一的印度文论在这个时期繁盛起来，达到了它的顶峰。与中国诗歌的繁荣相比，印度的梵语诗学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从公元7世纪开始，印度开始不断受到伊斯兰教势力的影响，并在986年被阿富汗征服。1001至1027年，伊斯兰先后17次远征印度，对印度教和佛教实施打击。1175年廓尔王朝开始对印度长达20年的征服，在北印度确立了伊斯兰的统治。但也正因为这样，才形成了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并存的局面，多种文化的相

互激荡，成为这个时期印度文论繁荣的基础。与印度文论交相辉映的是阿拉伯文论的异军突起。这个时期的阿拉伯，文化昌盛，文学繁荣，诞生了许多文学大家。穆罕默德之后的哈里发多次发动对外战争。750年，阿拔斯王朝的建立使得阿拉伯盛极一时，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繁荣，直到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

这一时期有两个受中国文化和文论影响的国家的文论诞生了，那就是日本文论和朝鲜文论。同样属于东方的波斯文学也在这个时期崛起，出现了长达十余万行的长诗《列王记》（亦称《王书》）及文论著作。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基本特点是欧洲文化与文论的衰落以及亚洲文化与文论的兴盛，这是一个亚洲文学理论的黄金时代！

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其顶峰的那一刻，同时也是它的高潮即将过去的征兆。欧洲文化在经历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极端繁荣之后，终于迎来了文化的萧条期。公元313年，“米兰敕令”颁布之后，基督教开始了其漫长的统治时间，欧洲社会从此进入了基督教的怀抱。统治阶级借助基督教控制人们的思想，逐渐形成了基督教专制文化。在基督教神学的统治下，欧洲的文化、艺术、科技等进入了一段异常黑暗的时期，那就是欧洲中世纪的到来。恩格斯曾经指出：“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都市。”基督教极端仇视文学和艺术，因为，文艺“给人的不是真理”，而是谎言。

因此，基督教曾经发动过多次毁灭艺术的运动。如公元4世纪，西阿多什大帝甚至发动所谓的镇压“邪教”的运动，把境内所有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庙宇神殿以及雕刻绘画等毁灭殆尽；公元8到9世纪，教会还发动了反对偶像崇拜运动，禁止用雕像和绘画来表现基督和圣徒。古希腊和古罗马辉煌的文化艺术在这个时期的欧洲显得那么渺小与微弱，在基督教神学的挤压下，更显得似乎是在苟延残喘，发挥不了自身深厚传统的优势，将欧洲文学艺术带入了一段黑暗的发展历程。再加上战争频繁，中世纪的前几百年基本处于一种混战的状态中，而各分裂国的统治者大多为蛮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除了拉丁文写成的教会类书籍外，几乎没有任何有影响的创作文学诞生，有的只是基督教神学的飞扬跋扈。直到公元843年罗马帝国分裂为西法兰克王国（法兰西）、东法兰克王国（日耳曼）和意大利，欧洲大陆三个主要国家的疆域随着外族的定居和封建化而初步定型。这样直到公元10世纪以后，由于社会的稳定和统一文字的形成，才逐渐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在中世纪前期的几百年中，几乎没有文学作品产生，只有基督教的专横和神学的肆虐。直至公元10世纪，才相继产生了英国史诗《贝奥武甫》（10世纪）、法国史诗《罗兰之歌》（11世纪）、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12世纪）、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13世纪）等作品^①。公元十二三世纪，骑士文学开始兴盛，有骑士抒情诗

^① 关于这些英雄史诗的成书年代，学界说法不一，这里参照的是四川大学石璞《欧美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观点。

与骑士传奇。同时，城市文学兴起，重要作品有《列那狐传》与《玫瑰传奇》等。中世纪晚期文学的兴起，成为 14 至 16 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前奏。中世纪晚期最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是这一时期的文论与美学思想家。在中世纪，尽管神学势力强大，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于是，在中世纪神性冰封的土地上，仍顽强地绽放出一朵朵艺术之花——悲剧、传奇、民谣、寓言故事、哥特式建筑、人物肖像、华美的雕塑、绚丽的服饰等等，甚至还有性爱诗，一道装点着中世纪的文化园地。人性本能和禁欲主义持续地较量着，神父们也无法回避这种交锋，他们“顽强的人性以及他们对古典文学和哲学的熟识，迫使他们去寻找一些巧妙的理由，为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的良知迫使他们所抛弃的艺术和美辩护”^①。美学，就在这种本能与禁欲较量的缝隙中存活着，尽管文学成就并不是很高。虽然基督教仇视文艺，但也需要为传教服务的艺术形式，那就是占主流地位的教会文艺。基督教将除基督教以外的一切都视为神学的婢女，对其他一切艺术形式都进行压制，文学只是为宗教服务的，文学是用来写圣歌、祈祷词、忏悔录，为圣徒立传的，目的是为了普及宗教教义，艺术上则大多充满了说教，文学的成分相对来说较为薄弱。

文化的黑暗和文学创作的萧条，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衰落。在长达 800 年的时间里，除了个别僧侣的只言片

① 凯·埃·吉尔伯特、赫·库恩《美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5 页。

语和一些修辞学以外，西方文论基本上是一片荒芜景象。但在上帝的名义下，美学——基督教神学美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既然基督教占据着最高的统治地位，既然一切科学、文化是一切美的本源，成为中世纪的美学信仰，且这一信仰直到中世纪后期仍然根深蒂固，神学家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谈论曾经被禁欲主义者严厉禁止的美及其相关的艺术诸问题了，但慑于宗教的压力，他们又小心翼翼地将美分为神性的美和世俗的美，并由此而将文学分为圣经文学和世俗文学，这一划分贯穿整个中世纪。神学家们同时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注重形式的传统，他们不仅丰富了古希腊罗马关于形式美的学说，同时又强化了它，对后世西方美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认为上帝是形式的形式，形式只是人们领悟上帝意志的中介，这样一来，形式就被纳入神学美学的范畴加以探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同时，他们认为形式更多的是侧重其外在性，是对世界的一种摹仿，这种做法对于祛除美学的神学外衣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以至于阿奎那说“美严格地讲属于形式的范畴”。然而世界是上帝意志的显现，所以，美或形式对世界、对自然的摹仿使文学都成了神学的附庸，中世纪文论在基督教神学的挤压下逐渐走向衰落，但也正因为基督教神学的兴起，诞生了市民文学（如广为流传的英雄史诗、故事、传说等等）和骑士文学等新兴的文学样式，然而作为文艺理论的出现，在市民文学和骑士文学上的表现还没有。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的但丁尽管已经有了人本主义思想，但那仅仅只是萌芽而已，而且相对于势力强大的基督教神学来说显得那么微弱，不足以扭转中

世纪文论的大趋势。因此，总体说来，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基督教神学。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文论所强调的美、美与善的关系以及摹仿说都在神学的框架体系内进行，并且其讨论的文论话语框架仍然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先哲就已经设定了的，讨论的深度和广度远远没有超出古希腊罗马的范围，因此，尽管其在某一点上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但都没有脱离神学的预设，且影响不大。中世纪文论不仅没有将古希腊罗马的辉煌发扬光大，反而在神学的引导和设限下将文论和文学创作一步步引向衰落的深渊，使得中世纪的文论停止在了前人的脚步面前，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出现了倒退。虽然出现了但丁的新文论观点，但其预示着西方文论又一个高峰的到来已是下个时期的事情了。因此，这一段时间可称之为欧洲文化与文论的衰落期。但中世纪的黑暗并不代表它没有意义，实际上，中世纪对欧洲后来的影响也不应被忽视，“中世纪的其他思想习惯也在欧洲的许多地方流传到了十六世纪”。

与欧洲文论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洲文论在此一时期迎来了他的黄金时期。在前几个世纪，亚洲文论的代表主要是指中国而言，而这一时期，除中国文论继续向前发展以外，亚洲其他国家的文论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那就是印度、阿拉伯、日本、波斯等国家文论的兴起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其国家文论史上的最高峰。

欧洲的中世纪，约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时期（420—1279）。与欧洲不同的是，中国在南北朝的动

荡年代达到了中国文论的高峰时期，并且在进入唐宋这样相对稳定的时期之后，其文学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中国文坛长期流行的一句老话，诗歌在唐代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乃至唐以后的诗歌创作都难以超越唐代所达到的高度。作为诗歌发达的国度，中国在诗歌理论上的贡献自不可小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指出“五言久矣”，对中国诗歌的源流作了考证，继续着刘勰的思路，唐代文人将诗歌提到了大规模创作的层面。“盛唐气象”作为唐代的一个辉煌，是其开放的姿态所致。在唐代，三教（儒、释、道）并立，不仅在政治、经济，也在文化上形成一种开放的文化氛围，由此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但唐代最为重要的文体创作当属诗歌，其最为值得探讨的理论也当然是诗歌理论。初唐史家的折衷文论调和了审美与功用，试图兼采南北之长并在天才与学力上折衷。同时，唐代诗选家注重德才双全，风骨与声律文采并举（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选家在选集的序中阐明自己的选择标准，实际上是自己对诗歌的看法，亦即自己的诗歌理论。由于诗歌的兴盛，所以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关于诗格的著作，探讨诗歌的声律、对偶，并进而研究诗歌在诗格上的其他技巧，如诗歌的字法与句法、诗的体与势、诗的流类及其与六义的搭配等，体现出严谨的探讨和哲理的探讨并举的轨迹。中唐时期，元稹和白居易提出了自己的新乐府的理论，讲求诗歌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而与此同时，从隋末的王通到唐代的柳宗元，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主张复古载道。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王昌龄提出了诗歌的意境说，皎

然则从“象”入手，使意境与意象区别开来，完成了王昌龄没有完成的工作，司空图提出了韵味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发展到宋代，词的创作成为文坛正宗，于是关于词的理论则继诗论之后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但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对于词论的探讨大多还集中于词的风格论上，对文学理论探讨最为集中的还是诗歌理论，因为词本身就是诗歌的一种。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系列的关于诗歌的理论和论著，譬如《六一诗话》、《诗人玉屑》、《沧浪诗话》等，提出了“夺胎换骨”、“活法”、“妙悟说”等关于诗歌的观点。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种新的批评形式，那就是大量的诗话的产生，对于丰富中国的文学批评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在宋代兴盛的理学则继承了儒家的学说，强调明心见性，存天理、灭人欲。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使得中国的文学达到了它的黄金时期，虽然其文学理论的成就没能超越魏晋南北朝，但却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同样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为世界三大文论之一的印度文论在这个时期也逐渐繁盛起来，达到了它的顶峰。与中国诗歌的繁荣相比，印度的梵语诗学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从公元7世纪开始，印度开始不断受到伊斯兰教势力的影响，并在986年被阿富汗征服。1001年至1027年，马默德先后17次远征印度，除了掠夺印度的财物、奴隶外，还对印度教和佛教实施打击。1175年，廓尔王朝开始对印度长达20年的征服，在北印度确立了伊斯兰的统治。但也正因为这样，才形成了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并存的局

面。三种文化的相互激荡，恰恰成为这个时期印度文论繁荣的基础。承接上个时期印度两大史诗和早期繁荣的佛教文学，印度的文学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重要的诗学著作数目众多，如婆摩诃《诗庄严论》，檀丁《诗镜》，伐摩那《诗庄严经》，优婆吒《摄庄严论》，阿难陀伐弹那（欢增）《韵光》，新护《舞论注》、《韵光注》，胜才《十色》，雪月《诗教》，曼摩吒《诗光》等等，多达几十部，可当之无愧地称这一时期为印度文论的高峰期。在这个时期，婆摩诃《诗庄严论》对《舞论》中提出的“庄严”进行了自己的发挥，并影响了以后文论的发展。在此后的两个世纪里，出现了檀丁《诗镜》、伐摩那《诗庄严经》、优婆吒《摄庄严论》、楼陀罗吒《诗庄严论》、婆闍《辩才女神颈项》、鲁耶迦《庄严论精华》和伐格薄吒《伐格薄吒庄严论》等，以至于在印度文论体系内形成了“庄严论”派。檀丁的《诗镜》对《诗庄严论》的风格论进行了自己的发挥，伐摩那承接檀丁，继续风格论的探讨，形成了有印度特色的风格论。而欢增的《韵光》则确立了印度文论的另一核心理论——“韵论”，由《诗庄严论》开其端，恭多迦《曲语生命论》确立了印度文论的又一核心理论——“曲语论”，而“味论”则在《舞论》的基础上继续着自己的发展脉络。印度文学理论的四大理论支柱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不仅如此，还诞生了印度本土的诗人学、合适论和推理论，体现出印度文论多维的一面。在这个时期的后期，曼摩吒对印度的梵语诗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以韵论为核心，广泛吸收庄严论、风格论和味论的合理成分，具有一定的理论创造性。而且，这个时期还诞生了

印度自己的戏剧理论——胜才《十色》，促进了印度文学理论的繁荣。

阿拔斯王朝建立的阿拉伯帝国横跨东西方三大洲，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发展，并发展了对外贸易，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出现了“百年翻译运动”，创造了精确的回历太阳历。在文学创作上，产生了《古兰经》和《一千零一夜》（也译作《天方夜谭》）这样影响深远的巨著，与文学创作的繁荣相一致的是文学批评的兴起和文学理论的自觉建构。阿拉伯的文学批评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诞生得相对晚些，但其文学批评的成就却并不低于其他国家。这个时期，阿拉伯学术泰斗贾希兹写出了《修辞与阐释》，提出了与中国“言意之辨”相似的“词”与“义”的关系问题，提出文学创作中“技”的问题，并认为“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是文学的永恒秘密所在。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及其作品还有伊本·萨拉姆《名诗人的品级》、伊本·穆阿泰兹《诗人的品级》、伊本·古泰白《诗与诗人们》、伊本·塔巴塔巴《诗之标准》、法拉比《诗书》、古达曼·本·佐法尔《诗的批评》、埃米迪《艾布·台玛木与布赫图里之比较》、杰尔加尼《修辞之秘诀》、赛阿里比《稀世珍宝》等，从诗人创作论到诗歌修辞论，从科学批评到历史批评、比较批评，形成了这个时期阿拉伯文论较为完备的文学理论系统。

这个时期有两个受中国文化和文论影响的国家的文论诞生了，那就是日本和朝鲜文论。日本的文学与文化长期处在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影响之下，但在这个时期诞生了对日本后世文学影响相当大的《万叶集》和《源氏物语》。随着文学的繁荣，随

之而来的是文学批评的繁荣和文学理论上的成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上出现了《古事记序》、《歌经标式》、释空海《文镜秘府论》、《新撰万叶集序》、《古今和歌集序》、壬生忠岑《和歌体十种》、藤原清府《奥义书》以及虎关师炼《济北诗话》等，从一开始受中国文论的影响发展到逐渐形成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从而使得日本文学和文学理论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同样与中国相近的朝鲜文论也发展起来，产生了李仁老的《破闲集》、李奎报的《白云小说》等，成为朝鲜文论的滥觞。同样属于东方的波斯文学也在这个时期崛起，出现了长达 10 余万行的长诗《列王记》（亦称《王书》），而昂苏尔·基卡乌斯的《卡布斯教诲录》则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学批评观，并进行了文学批评实践，内扎米·阿鲁兹伊《文苑精英》（亦译《四论》）论诗人及其诗学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总之，尽管这个时期波斯文论还不能说已经形成气候，但却为后来波斯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不可估量的基础。

由此可见，在中世纪欧洲文化与文学走向衰落的时候，亚洲文化与文论却正在逐步走向它的繁荣期。应该说，中世纪的欧洲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样式，那就是骑士文学和城市文学，但由于其在文学理论上没能突破原有文学理论的框架，甚至被原有理论框架所束缚，反而限制了文学的发展，在文学理论上的创新就更是少见。亚洲文学则不同，各国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尤其是产生了好几个文论的新生长点：长期受中国影响的日本和朝鲜于此时期在融汇外来文化的同时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阿拉伯则在此一时

期走向了民族文学创作和文论的繁荣期，波斯文论也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文学理论体系。中世纪的欧洲和亚洲在相同的发展时期却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景象，这是由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境造成的，但不论西方的衰落还是东方的繁荣，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五编

公元七至九世纪的中外文论

